

香港是時候進行司法改革了



最近有關香港司法界的討論沸沸揚揚。前有多宗暴亂案件出現輕判輕放的現象，後有裁判官何俊堯調職事件引來的爭議，一個「立場偏頗、判決不公」的裁判官，卻被「暗升」，已然引起社會公憤，香港司法機構所存在的頑疾暴露無遺。法治精神是大部分香港人引以為傲

的核心價值。而司法界近期發生的種種事件，卻在瓦解法治這塊最重要基石，辜負了社會大眾對法治的信任。筆者認為，在國安法下，在香港止暴制亂的關鍵時刻，必須要果斷進行司法改革，才能止暴制亂，重建司法的公平正義！

何君堯 立法會議員

回顧過去一年多香港的暴亂案件，其中存在不少輕判輕放的現象，引起了社會爭議，尤其是近期黎智英的涉恐嚇記者案中，再次出現了「高高舉起、輕輕放低」的現象，雖然黎智英在刑記者案中表證成立，最終卻「獲放生」，被裁定刑事恐嚇罪名不成立。簡直是匪夷所思！

司法機構怎能縱容黑暴

更令人不能接受的是，這次案件案情原本十分簡單，卻耗費了3年時間。再聯想到反修例相關案件，從去年6月9日至今今年9月6日，警方共拘捕10,016人，檢控2,210人，目前只有471人已完司法程序。更是有眾多「黑暴」案件被判無罪或輕判，這根本就無法對社會起到阻嚇作用，等於變相直接鼓勵犯罪，也是香港一直未能止暴制亂的最大原因。

東區裁判法院裁判官何俊堯屢次對犯罪份子輕判輕放，有失公允，從而被人投訴，但司法機構竟將其調任至高院負責刑事案件排期工作，背地裏升職加薪，引起全城哄動。而至今司法機構連個合

理解釋都沒有，更無監管機制，難平民憤！

外部勢力在干涉香港司法

香港司法的種種問題，背後有着外國勢力的影子。尤其在當下，各種勢力都盤踞勾結，嚴重威脅到國家安全和香港穩定。

香港這幫暴徒甚至背後的支持者，一直很喜歡將烏克蘭和香港比較，說香港的暴亂是嘗試模仿烏克蘭2013-2014年那次運動。的確，我們可以看出兩者的相若之處，但香港是中國的窗口，而烏克蘭更像是俄羅斯的附庸。烏克蘭的暴亂表面上是政客們把經濟搞得一團糟引發了社會動盪，但美國等國家的介入，針對俄羅斯，才是背後的主因。

如今，亂港分子想要爭權，如果選舉可以解決，他們會盡量通過這條渠道去奪取，而美國等西方国家也會同聲同氣地配合，他們是同一個集團，目標是一樣的，不需要細節對錯，就是要用輿論與法律來爭取他們的政治高地，直至取勝為止，背後可以用盡一切手段來營造出虛假的道德高地。

他們鑽法律的空子，讓罪有應得者逍遙法外，還在香港社會上營造出「違法達義」的氣氛，使得街頭暴力更加有恃無恐，社會上黑暴一直未有止息。這樣更說明了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是時候堵上那些司法實踐的漏洞了！哪怕改革的推進必會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撓，其中就包括以往受益最多的「反對派」，但絕不能被這樣所謂的道德表象所迷惑，香港的司法必須作出改變。

司法改革要從內部進行

筆者認為，推進司法改革，可以分為三點來進行。

首先，司法改革要從形式上做起。香港司法制度秉承英國傳統，法官假髮都仍然繼續戴，但香港早已回歸祖國，怎麼還能戴着別國民族的假髮，來定奪本國國民的是非？香港法官應該脫去假髮，要維持法庭的權威，並非由形式出發，而是要判罰分明，公平公正，才能得到民眾发自内心的尊重。

其次，香港法官應分期到內地參加國情班，加深對祖國的了解。回歸以來，香港實行「一國兩

制」，高度自治，但香港不少法官在「司法獨立」與中央「全面治權」之間未找到合適的位置自處，長久以來已與國家脫節。近一年香港社會問題突出，此問題更加凸顯。筆者認為，作為從事司法工作、捍衛香港法治者，認識基本國情、深刻理解「一國兩制」的內涵是基本素質，試問，如果不愛國又怎會真正愛港？

再者，需要更有代表性的推薦委員會來推薦法官。目前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由9名人員組成，除了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以及律政司司長外，其他4人均為法律界人士，包括兩名法官，以及律師公會和大律師公會代表，只有3人是由特首委任的非法律界人士，易造成「官官相護」，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需要改革，可以考慮增加名額，讓沒有利益衝突的人去主導委任，修補委任法官的漏洞。

筆者認為，香港的司法改革已經刻不容緩。只有從司法體系內部深入改革，促使司法更加公平公正，才能配合國安法的有效實施，完成止暴制亂的任務，維護香港社會的長久安定。

應設監察機制監察「司法獨大」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基本法規定的特區政治體制，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並非「三權分立」，更不是「司法獨大」。不能以「司法獨立」之名擴大司法權，架空行政主導體制和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近期涉及黑暴的案件，除了有確鑿錄像證據的罪成之外，不少由現場警員作證的案件均在「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原則下令疑犯脫罪。日前又曝出判案備受爭議的裁判官何俊堯不僅未受罰，反而升職加薪，備受重用的醜聞。事出反常必有妖。何俊堯多次判決都惹來爭議，包括：在庭上稱讚在立法會搗亂的前「香港眾志」被告為「未來社會棟樑」，又說向民警宿舍擲汽油彈的縱火暴徒沒導致任何人受傷，「唯一受傷可能係被告被制服嘅時候」，更多次稱員警作供大話不可信，明顯地偏袒攬炒派。公眾質疑為何何俊堯升職和大幅加薪，是否司法獨大，官官相衛？公眾擔心何俊堯會利用職權與其他「黃官」互相勾結，暗地裏「反政府、反中央」，要求司法機構暫停有關安排，並建

議當局公開及透明地交代排期法官在分派案件時考慮的因素和標準。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去信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要求他嚴肅跟進何俊堯過去審理的多宗涉及反修例示威案件時立場偏頗，讓案中被告脫罪，令公眾懷疑其判案時有政治傾向，因此要求馬道立即時停止讓何官審理政治相關的案件，以釋公眾疑慮。從事態發展來看，馬道立似乎已回應了葛珮帆的要求，因為何俊堯不僅未受罰，反而調職加薪，備受重用。馬道立發出的訊息分明就是司法獨大，但是，香港司法是否獨大？如何能制衡司法獨大挽回市民對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

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對香港司法獨大弊端的批評一針見血，包括：法官通過審理相關案件，把自己抬高到了全國人大的位置，由此自我賦權意圖否定全國人大的憲制地位；法院裁決長篇累牘囉嗦，迫使公眾沉默，而法庭判決則更加有恃無恐，唯我獨尊；法院持續地讓公共利益屈從於個人權利的主張，這實質上變相直接鼓勵「違法達義」，法院在過去一年裏幫助創造了導致街頭混亂的社會環境，實際上不僅僅是包容，而是在縱容街頭暴力；最糟糕的是，法院允許律師顛倒基本法，它不是香港穩定繁榮的保障，而是被用來擊斃法律和秩序的華度。烈顯倫大聲疾呼：「當下司法機構受弊端困擾，需要改革。」

目前，司法機構內部雖設有《法官行為指引》，作為法官遵守行為的準則，但只屬指引性文件，並不同法律，即使有法官違反了該指引，也無施加任何罰則。制衡司法獨大，政府及司法機構應參考英國等海外國家的做法，盡快設立由法律界人士及非法律界人士組成的量刑委員會和監察司法委員會。事實上，量刑委員會和監察司法委員會並非新鮮事，很多奉行普通法的國家，如英國、美國、加拿大、新西蘭等，都已有監察司法的獨立機制，故此香港要設立量刑委員會和監察司法委員會並不困難，有很多國家可借鏡。設立量刑委員會及獨立監察司法委員會，可以增加法律本身的認受性及司法系統公眾參與度，從而真正做到審判公平公正，挽回市民對本港司法制度信心。

頭混亂的社會環境，實際上不僅僅是包容，而是在縱容街頭暴力；最糟糕的是，法院允許律師顛倒基本法，它不是香港穩定繁榮的保障，而是被用來擊斃法律和秩序的華度。烈顯倫大聲疾呼：「當下司法機構受弊端困擾，需要改革。」

黃錦輝 教授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政府推行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截至昨日晚6時，有約136萬人登記預約，有超過170萬市民已接受採樣。這次大型的社區檢測對增強特區政府應對疫情能力，加快本地經濟復甦，以至盡快恢復與內地和海外部分國家通關都有重要作用。



檢測人數固然越多越好，但政府強迫市民參與的做法不切實際，並會惹來部分市民反感。事實上在全民抗疫之際，絕對不宜為社會添煩添亂。因此，筆者認為政府「做得多做得多」的策略是最佳的折衷方法。

筆者認為不參與人士對「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的目的只是一知半解。第一，從心理學角度而言，儘管採樣與檢測有時差，但當參與者獲得陰性結果時必然會感到額外安心。第二，計劃的設計及落實可以為政府未來防疫抗疫作好準備，倘若同類型的傳染病再次發生時，政府也能有效應付。大家試想想，今次政府能夠適當控制新冠疫情，其中一個原因是吸取了2003年「沙士」抗疫的經驗。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切斷隱形傳播鏈。迄今檢測發現了26宗確診個案，政府隨即嘗試找出這些隱形患者的密切接觸者，針對性地為他們進行檢測；與此同時也會為患者出入過的地方進行徹底消毒。這些措施都能大大減低新冠病毒傳播的風險。

從經濟復甦角度，筆者認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非常之關鍵。疫情之下，香港百業蕭條，經濟呆滯不前，旅遊、零售、餐飲、生產等產業無一倖免。以旅遊為例，無論入境或出境人數都受到重創，生意額跌至近乎零。香港機場4月至8月的客運量及飛機起降量分別比去年同期大跌99%及72%，長此下去，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恐怕一去不返。為了盡快挽救此頹勢，政府正在與11個國家聯絡，表達與對方建立「旅遊氣泡」(Travel Bubble)的意願，互相通關。要讓其他國家評估香港的疫情風險，「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包括檢測後的跟進工作等都會增加香港在談判桌上的籌碼。

除了國際旅遊之外，與內地回復正常通關對香港經濟復甦更加迫切。包括筆者在內的多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建議香港與內地政府推出兩地互認的「健康碼」，不過要落實這計劃，香港必須先要向內地政府證實其疫情已完全受控，就此「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尤其重要。

筆者非常支持「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認為它能幫助香港走出出現時的困局。藉此亦衷心感謝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離鄉別井遠道而來，協助香港加強病毒檢測能力，以及建設臨時醫院和擴展社區治療設施的規模。

王偉傑 香港未來教育協會行政部總監

教育局宣布由9月16日起恢復分階段面授課程，這無疑對應屆文憑試的中六生是一個好消息，畢竟網課始終未能取代師生的互動，老師亦可藉早日面授課程追回落後的進度。然而，即使校方已就面授的安排準備就緒，但也難保在全面恢復實體課堂後病毒不會在校園蔓延，師生及其他學校的持份者應踴躍參與全民檢測，有效減低疫情在校園爆發的機會。

正如多位專家表示，一個帶有新肺炎病毒的隱形患者可感染整個餐廳的人，更何況是每日接觸成千上百名學生的教師！筆者當然衷心希望各位老師身體健康，但只有陰性的檢測結果才能確保教育界同事沒有患上新冠肺炎，令學生和家長放心。

還未參與檢測的教師除了自覺沒症狀外，可能還相信恢復面授後只要戴口罩，便無懼病毒傳播的風險。筆者固然對教師的衛生意識充滿信心，但狡猾的病毒卻往往在我們不留神的情況下殺我們個措手不及。置身在有空調的教員室，教師偶爾打噴嚏或流鼻水也屬人之常情。縱然教師立刻洗手清潔，也難保雙手沒有殘留一些分泌物。倘若學校真的有教師是隱形帶菌者，由於病毒在不同物料表面可存活的時間由30分鐘至7天不等，萬一有學生沾到受感染老師的分泌物而未洗手前觸摸眼睛，一次新冠肺炎的感染便一觸即發。如果所有教職員在檢測後都呈陰性結果，學校上下自能安心繼續教學活動。即使萬一有教職員不幸感染，學校也能在停課14天及做足消毒措施後如常復課，這總比疫情在校園爆發而被勒令停課更為理想。

誠然，有效遏止病毒在恢復面授後在校園傳播不能單靠老師參加檢測，學生自覺參加也是減少感染風險的關鍵。教師可以身作则參加檢測，既能驅使尚在猶豫的學生主動參加，也可藉機講述參加普檢是體現公民責任的一種方式，身體力行上一堂珍貴的公民教育課。

普檢計劃助力香港經濟復甦

師生齊檢測 復課更安心

美國打科技戰殺敵一千自損千二

曾淵滄 博士



中美貿易戰打了兩年，今年年初終於簽署了首階段貿易協議，之後就沒有任何次階段的貿易談判。在首階段的協議中，中國答應增加購買美國的農產品，美國答應不再增加仍未加上的關稅，已加的關稅則保持不變。

到8月份，中國對美國的貿易出口按年增長22%。很明顯的，特朗普在這場貿易戰中失敗了。不過，中國政府並沒有大事宣傳這件事，相反是高調地宣布擴大進口美國的農產品，不久前中美貿易代表也開過一次會，會中雙方都表示滿意進展，中國依協議購買足量的美國農產品，而美國消費者在關稅之下依然選購中國產品，因此美國貿易代表也難以挑剔中國在貿易協議中的表現。

美國任何打壓中國的手法，實際上都是兩敗俱傷的，上個星期美國科技股出現小股

災，至今依然未止跌，科技股小股災的原因之一是特朗普說股民套利沽貨，另一個原因是市場開始擔心中美科技戰會影響美國科技企業的利益。舉個例子，當特朗普下令禁止美國企業與微信做生意，美國傳媒第一時間馬上指出這些措施對美國的iphone影響巨大，iphone將因此而失去14億人口的市場。理由是14億中國人多數會選擇保留微信而不用iphone手機。因此，總統行政命令下達之後，美國貿易官員私下告訴蘋果公司這道行政命令將作出修改，禁令範圍將不包括中國內地。古語有云，殺敵一千，自損八百，而特朗普的貿易戰已經證明是殺敵一千，自損千二。現在，由貿易戰轉向科技戰，怎不讓美國科技企業感到擔心？

特朗普的科技戰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禁止中國的高科技進入美國市場，目的是不讓

中國的高科技企業賺美國的錢，最佳例子當然是禁止華為、中興為美國建設5G通訊系統；另一種科技戰是卡住中國科技企業的咽喉，不准美國企業及全球所有應用美國科技的企業出售零件給中國的科技公司，主要的針對對象當然也少不了華為。

不讓中國賺美國的錢，代價是美國的5G通訊就會落後於中國，將來5G應用也會落後於中國甚至落後於全世界許多地方。不准美國企業出售關鍵性的零件給中國，短期內的確能打擊中國的科技企業，但是代價是美國的科技企業損失了巨大的市場，少了來自中國的巨大收入，美國科技企業哪來的利潤去繼續研發？數年之後，中國也可能自行成功研發替代品，美國的科技企業就會永遠失去這些訂單。



深圳：充滿創新和危機意識的城市

唐傑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教授 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長

深圳是一座年輕移民城市，具有經濟社會學中特有群體危機意識，構成了敢闖、敢試、敢為天下先的文化基因。深圳極大地壓縮了城市成長轉型的時間，四十年時間，經過多次轉型衰退構成的由低向高快速升級，走向了世界創新城市的前沿。

城市的發展是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也是社會學和文化學研究的對象。引起我們關注的是深圳獨特的城市社會文化學和社會經濟學現象。或者說，僅僅用經濟學思維闡述深圳的發展是有缺陷的。

深圳是一座基本沒有資源稟賦的城市，流動中的移民人口構成了這座城市的稟賦，構成了特有的社會文化學特徵。其中最為鮮明的可能是，從流動人口到移民，對所選擇的遷徙城市未來的前景會很敏感，這就構成了深圳所特有的滲透到骨髓的危機意識。

過往四十年，深圳遭遇多次挫折與衰退，引起過無數次關於危機的討論。

一直以來的說法是，深圳建市之初只有兩個工程師。

經過短短數十年的發展，截至2019年底，深圳GDP從不到2億增長為2.7萬億元。PCT國際專利申請量18,081件，連續15年居國內城市之首，總量超過英國、韓國、新加坡，用40年成長為國際創新之都，堪稱是一個奇跡，背後的原因和路徑值得解讀。

深圳無疑是推行改革開放最為系統的特區，市場化改革貫穿於深圳40年發展的全過程。深圳創新的基因隱藏在市場化的進程中。早期集中改革動能，着力構建市場經濟體系，把資源配置方式轉向市場主導，包括鼓勵興辦私營企業、引進外資、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建立證券交易所等等，這些看似與創新沒有直接關聯的改革措施，後來成為深圳走向創新的重要制度基礎。

計劃經濟年代，人的能动性被束縛在各種條條框框中，就像當時的廣播體操呈現的圖

景，所有人動作整齊劃一，僅僅在第八節跳躍運動時能看見某些有能量的人比其他人蹦得高那麼幾公分。深圳的市場化進程給這些高能級的人提供了發揮的機會，那些能在第八節跳躍運動中比別人蹦得高的人選擇到了深圳。

深圳創新秘訣裏很重要的一條在於：深圳是中國第一個把創新從純科研的活動轉變成為經濟活動的城市，長期以來，高度行政化科研系統掌握了創新的人話語權、資源配置權、創新活動的評價權，是科技、經濟兩張皮的根源。

市場化使企業家成為創新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創新投入產出效率高，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有優勢，創新就會成為一種蜂聚和蜂聚擴散的現象，創新引來了更多的創新，成功的企業帶動了更多企業走向成功。

(走向世界城市前沿的深圳系列六之一，未完，明日續)

